

社科研究文丛

制度的成本约束功能

——对中国经济体制变迁的分析

ZHI DU DE CHEN BEN
YUE SHU GONG NENG

陈 维 著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制度的成本约束功能

—对中国经济体制变迁的分析

陈 维 著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制度的成本约束功能:对中国经济体制变迁的分析/陈维著.
—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0.4(社科研究文丛)

ISBN 7-80618-663-8

I. 制... II. 陈... III. ①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中国②
国有企业-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中国 IV. F279.2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1999)第56722号

制度的成本约束功能

——对中国经济体制变迁的分析

著 者:陈 维

责任编辑:周 河

出版发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上海淮海中路622弄7号 电话53060606 邮编200020)

经 销: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印 刷:常熟市大宏印刷厂

开 本:850×1168毫米 1/32开

印 张:6.375

字 数:154千字

版 次:2000年4月第1版 2000年4月第1次印刷

印 数:0001—1200

ISBN 7-80618-663-8/F·432 定价:12.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序

陈维博士的《制度的成本约束功能——对中国经济体制变迁的分析》，从成本约束制度这一全新的视角，剖析我国经济改革和发展中的一个最核心问题，即中国经济发展怎样才能走出一种粗放型的落后状态，甚至是严重粗放型的人为困境？

从前苏联发轫的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以低消费、高积累所获取的高增长，却以低效率为其基本特征。在当时，大批企业不仅微观效益十分低下，即使是宏观效益也不甚理想。高额的国家投资效率不高，整个国民经济一再发生重大的比例失调；市场供不应求，特别是消费市场长期严重短缺，更是那一时期社会经济中的特有畸态。

我国的改革是从破除传统的、单一的计划经济体制开始的，是以市场经济体制的效率去否定计划经济体制的低效率。20年来的改革历程，在调动企业和个人的积极性、在提高经济效率等方面，取得了重大突破，但也留下了一些缺陷和值得深思的问题。问题的核心依然是在经济效益方面。

否定传统体制中的总产值考核指标，代之以国内生产总值的指标考核，其出发点是消除总产值指标中的重复计算，避免各类虚假现象对生产与核算的影响。但实际情况并不事随人意。围绕着GDP考核指标，一些部门为了完成增长速度的“政绩”，仍不断地向下压指标。而企业不是用“搬砖头”等方式虚与应付，就是被迫从事不为市场需要的盲目生产。再看近几年国家税收收入与企业效益的对比资料，一方面是国家税收年年大幅度增长，另

一方面却是企业经营业绩并不理想。这一矛盾如何解释？除了流转税的增长并不直接与企业效益挂钩以外，更是由于多种原因所导致的企业在利润计算中的作假。如一些上市公司为制作漂亮的上市报告、为争得更好的配股资格而作假；一般企业冒算利润则是为了经营者和职工获取更多的个人利益。可见，在目前的环境中，即使以利润指标进行考核，也会有各种不讲效益的虚假现象产生。

经济体制改革以来，在历次党代会和人代会上，都反复强调要实现生产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提高我国的经济效益。可是，这一转轨又似乎是十分困难，真所谓是年年讲，又年年问题成堆。特别是不少投资项目效益低下，更成了人所共知的一个老问题。究其原因，乃是项目决策层层过问，显得无限“慎重”，而出现问题却无人负责也无法负责。至于在微观企业层次，在改革进程中又出现了内部人控制、成本外部化等不少新的弊端。

旧的体制、旧的弊端在否定中，新的问题、新的弊端又在产生，这就是我国社会经济进程中的真实情况。怎么使我们的新体制更加健康和完善，怎么使我们的经济更具活力和效益，无疑是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必须深入研究的重大课题。

市场经济的改革导向，是否定传统体制种种弊端的一把利剑。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制度是以公有制为主导、为基础的市场经济，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结合，是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创新之点，也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基石。不过，社会主义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相结合，却是一种前无古人的伟大探索。我国20年来的改革历程，清晰显示了这种探索所取得的伟大成就，但也只是迈出了这方面探索的第一步，因为还没有最终解决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完美结合问题。

我国20年来的高速增长，主要是靠多元经济的发展，靠体制外的增长，具体表现在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外资经济等各种

非公有制经济每年几乎都以20%多、甚至是40%多的速度高速增长,而公有制经济,特别是国有经济的增长却显得比较缓慢。在改革之初,相当一部分人士囿于传统观念,认为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制度不能相容,市场经济与公有制不能结合。事隔20年之后,又有相当一部分人士认为,公有制是经济低效率之源,公有制难为市场经济所容。前后两种否定公有制与市场经济可以结合的观点,尽管出发点大相径庭,结论却基本一致。我国的改革是一种从农村到城市、从小城市到大城市、从非公有制经济到公有制经济、从体制外到体制内的局部推进式的改革。相对于当年苏联、东欧的“休克疗法”,我国渐进式改革显示了巨大的成功。但是却也为此付出了一定的代价,特别是国有企业因改革滞后所付出的沉重代价。20年来,国有企业是在不同程度地被捆着手脚的状况下走向市场的,从而难以与天生市场经济派的非公有制企业相竞争。从70年代末的放权让利到90年代初仍在实行的承包制,说到底只能是不同程度的改良而谈不上是真正的改革。90年代中期所推出的现代企业制度改革,尽管在改革的理论与模式设计上已经相当合理,但由于宏观条件或者说国有企业改革的基本环境还不完善,就必然会影响其实施效果。从总体上说,国有企业改革问题上反映出来的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结合问题,确实还有待于进一步的探索。正如江泽民主席反复强调的那样,这一探索不仅关系到国有经济的发展,而且还将影响到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成败与整个社会发展的前途。

本书的可贵之处,是从成本约束这一似乎是纯技术的角度进行研究,逐步深入和展开,但触及的却是国有经济改革中的最核心问题,即公有制与市场经济如何结合、如何提高国有资产运作效率的问题。缺乏约束力,或者是制度上的软约束,是国有经济的最大问题。本书作者从市场化与成本约束、产权与成本约束、意识形态与成本约束、内部约束与外部约束等不同方面,作出了

深入的理论分析,并提出了建立合理成本约束制度的模式与建议。而这一切,都要以国有企业改革的真正到位,或者是政企分离的改革成功为前提。

袁恩桢

1999年6月11日

目 录

序.....	袁恩桢(1)
导言.....	(1)
第一章 成本与收益及两者关系的制度含义.....	(13)
一、成本及其内涵.....	(13)
二、收益的内容和分析.....	(24)
三、成本和收益间的关系.....	(26)
四、成本的基本功能和研究目的.....	(27)
第二章 成本因素:影响制度变迁的核心原因	(29)
一、制度变迁中诸因素的重要性分析.....	(29)
二、经济利益是制度变迁的决定性因素.....	(34)
三、制度变迁分析中对诸多因素的约简.....	(38)
四、成本比较作为制度变迁中的核心因素的理由.....	(39)
第三章 利益追求的天然性和成本约束的社会性.....	(42)
一、利益和成本是社会经济的永恒话题.....	(42)
二、利益追求的天然性分析.....	(45)
三、成本、成本约束的社会性	(49)
四、成本约束制度的社会功能.....	(52)
第四章 对我国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中成本约束制度的评析.....	(56)
一、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中成本约束制度的主要特点.....	(56)
二、问题与症结.....	(62)
三、中国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中成本约束制度的历史 渊源.....	(65)
第五章 制度变迁中总体成本的变动趋向.....	(68)

一、概述·····	(68)
二、制度变迁中总体成本的变动分析·····	(69)
三、社会利益主体多元状况下的成本博弈·····	(76)
第六章 成本变性:内部化与外部化 ·····	(81)
一、成本的内部化与外部化·····	(81)
二、不同约束状况中的成本使用·····	(85)
三、成本变性及其方式和途径·····	(90)
第七章 市场化:成本约束的必要环境 ·····	(97)
一、市场化对成本的约束功能·····	(97)
二、成本市场化所遵循的原则·····	(103)
三、成本市场化的途径和效用·····	(105)
第八章 产权与成本约束 ·····	(112)
一、正确理解和运用产权的角度·····	(112)
二、产权理论的内容和发展·····	(117)
三、几点结论·····	(122)
第九章 意识形态与成本约束 ·····	(124)
一、意识形态功能的基础·····	(124)
二、意识形态在成本约束中的作用·····	(128)
三、中国在意识形态约束方面的经验教训·····	(132)
第十章 成本约束:对承包制在我国农业和工业企业中的 不同效用分析 ·····	(140)
一、承包制实践是研究成本约束理论的“宝库”·····	(140)
二、承包制在农业和工业中产生不同效用的主要 原因分析·····	(141)
三、承包制实践在理论上的启示和意义·····	(146)
四、成本约束制度:新经济体制的基础·····	(151)
第十一章 成本约束松懈对制度变迁的反向拉动分析 ·····	(154)
一、成本与收益的脱节是制度变迁实际进程中的强烈	

倾向	(154)
二、制度变迁过程中的制度体系及成本约束制度的地位	(155)
三、从制度体系中引伸出的制度变迁顺序	(158)
四、基础性制度变迁的核心——成本约束制度的完善	(159)
五、约束制度松懈将扭曲制度变迁的方向	(161)
六、几点结论	(166)
第十二章 重建成本约束制度:中国新经济体制的基石	(169)
一、再论成本约束制度在经济体制中的重要性	(169)
二、不同的成本约束制度比较	(173)
三、中国建立合理成本约束制度的现实基础	(175)
四、中国建立新成本约束制度的现实途径和方式	(180)
参考文献	(189)

导 言

—

通过20年的风风雨雨、成功与挫折,我们的认识在不断提高和深化,愈来愈感受到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在本质上是一次深刻的制度变迁过程,也即意味着必须进行制度重构,基础再造,才能真正实现改革目标。

在制度变迁理论研究方面,成本与收益比较理论已成为基本的研究手段。新制度经济学分析制度变迁的一般演绎逻辑是:为了获得更大的收入或减少某些成本,社会致力于制度创新;当新体制所能提供的边际收益等于变革旧制度所需付出的边际成本时,体制变迁就会暂时停止,制度结构就达到了某种“均衡”;当新的条件产生时,才会又发生对新制度的“需求”和“供给”。

其实,收益与成本比较的理论是经济学中最基本、最基础的分析工具。早在亚当·斯密的关于经济人学说中已得到深刻运用,但斯密只是用来阐明个人在微观层次上是如何展开对利益追求的运作机理。而在新制度经济学中,成本与收益比较理论被提升到一个新的层次,并被赋予新的含义:对宏观的、以社会制度、政治体制和其他社会形态为表象的巨大社会变迁过程进行经济意义上的分析。这无疑是经济理论发展进化上的一次演进。

但中国的经济改革实践却使一般的成本与收益比较理论的可信性发生了问题。中国的经济改革实践暴露出原有成本与收益比较理论在它的运用和阐述中,仅注意了在假定基础上的逻辑

演进,而忽视了在不同条件下社会实践中的“异化”倾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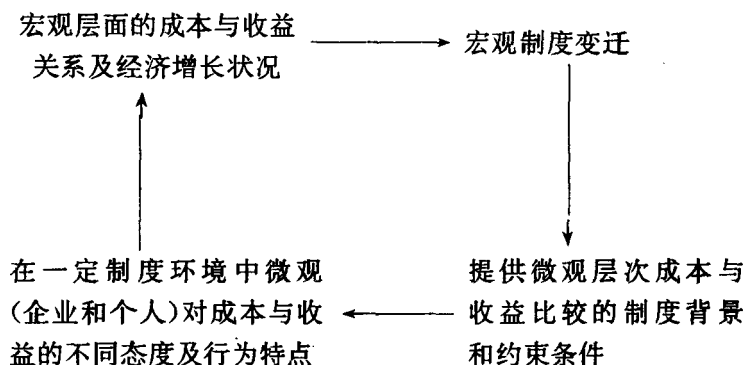
宏观的成本与收益比较理论是建立在一个既定前提上的,那就是成本与收益之间存在着反向关系:在总产出一定时,成本增大意味着收益减少;反之,收益增加则是成本节约和成本利用效率提高的结果。因此,在成本与收益之间的这种关系一定时,人们在逐利欲望的驱使下就会去寻找那些有利于扩大收益、减少成本支出的活动路径。在以往的制度变迁理论研究中,运用成本与收益比较方法时,大都默认这样一个前提,或是假定基本上解决了这一问题。

但是,宏观表现只是微观活动的结果。宏观的成本与收益比较分析是建立在微观理论基础上的;其核心是依据个人对经济利益的追求和对影响利益的主要因素——成本——的关注,决定了他们在社会经济活动中的思维、行为和态度,从而演绎出宏观层面的变化和结果。然而,在微观上,人们的态度是追求利益,但强烈地推托成本,力求成本的外部化;而在宏观上,社会意愿是努力降低成本,提高收益。这两者之间存在着本质差异和尖锐矛盾。当在微观层次上成本与收益脱节、两者之间不成反向关系时,就很难在宏观上运用成本与收益比较方法对制度变迁的方向进行“自然的”分析。因为在个人或企业的成本与收益脱节的状况下,在总产出一定时,个人或企业收益增加的同时很可能是社会成本的成倍放大。它可能使制度变迁的走向完全相反,即制度变迁的结果将是经济运行更加的低效率。当成本与收益之间的关系在实践中存在缺陷时,成本与收益比较理论的运用就缺乏可信度,建立在其之上的制度变迁分析理论就具有片面性,并产生一定程度上的误导。

成本与收益比较理论在中国的扭曲表现是不奇怪的。因为在西方,这一理论的正确性是由其微观层次传导到宏观层次的。而在中国,由于缺乏坚实的微观层次的基础,在由宏观层次推导

到微观层面时就出现严重变形,最终导致整个演绎的失败,和这一理论在实践中的失灵。

为了使宏观分析更符合实际结果,并使得成本与收益比较能产生积极效用,制度变迁的首要任务是在微观层次建立起成本与收益的合理关系。同时在理论分析方面,必须紧密结合微观实际状况来判断其对宏观层面的结果和影响。不同层次对成本与收益的态度、行为及制度约束的交互关系可以下图表示:



成本与收益比较理论在中国的实际效用,及在中国建设和完善合理的成本约束制度,对以上问题进行实证性研究分析的浓厚兴趣构成了本文的写作动机和主要内容。

二

为了获得电话有奖竞猜的5000元奖品,却耗费5.4万元的电话费用,这是成本大于收益的经济活动的极普通一例。这对于惯常运用成本与收益比较理论的学者来说是不可思议的。结论是:这是一个非理性的人作出的非理性的行为。然而,在现实生活中,这又确实是一个理性的人作出的理性行为:因为他的电话费

用由企业支付,而奖品则归他个人所有,付出和所得这两者之间严重脱节。在中国的改革进程中,类似的事情正在大量发生:国有企业中大量国有资产的非正常流失;对待国有资产的冷漠态度和处置方式;企业和政府机构中严重的腐败行为(对腐败的经典释义之一是:腐败就是政府官员为了个人利益而出卖政府财产);等等。世界性组织“国际经济增长研究中心”认为发展中国家面临的难题之一是生产过程难以用低投入、高产出的方式来实现,其原因之一是许多行政和经济部门更多强调职业道德的自我约束而较少重视法规的管束,因此这些部门的人员一旦产生追求个人经济利益的动机,便会将本来用于保证社会发展和福利的“租金”部分或全部地转向给予他们回报的“寻租者”,自己作为“供租者”与“寻租者”一起分享好处^①。应引起警惕的是,以企业巨额的成本支出乃至亏损为代价来博得个人收益的增加,正在成为一些国有企业和机构的时髦思维和行为方式。云南玉溪红塔烟草(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原董事长、总裁褚时健被检察院指控合伙贪污355万美元,单独贪污1156万美元,被法院判处无期徒刑是这方面的典型事例。这类问题如得不到有效解决,宏观层面的制度变迁的效果是可想而知的。

中国市场趋向的经济改革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关于“经济人”的理论,试图依据社会成员和企业对自身经济利益的追求来推进经济发展。但必须重视的是,经济人对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及其作用的增大是与约束制度的完善一同俱来的。如缺乏有效约束制度,经济人的作用极易走向反面。

经济人的培育和成长并不能自然形成理性的市场经济局面,经济人也并不总是有利于经济增长和资源(成本)节约的。经济人的积极作用完全建立在社会合理的制度基础上,表现为整个社

^① 参阅国际经济增长研究中心编:《制度分析与发展的反思——问题与抉择》,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

会制度体系有效规范的产物。因此,制度基础即成本约束机制是在制度变迁和经济体制改革中必须十分注意的一个内容,也可以说是一个关系到制度变迁和改革能否成功的核心因素。

社会制度是一个系统,它由不同层次、各具特殊功能的制度所组成。基本上可以这样认为,制度变迁或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是成本约束制度,特别是微观层面的成本约束制度的转变和重建。而这一变革深刻地涉及到财产制度和产权关系,并提出了在制度变迁过程中必须针对具体情况确定变迁的顺序及改革重点的问题。

一种制度体系有其特定的成本约束方式和特点。但这并不是观念想象的产物,而是客观经济条件、环境、财产关系、意识形态等基本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制度变迁和体制转变的成功在于对以上众多基本因素的变革,并在其综合作用的基础上重建合适的成本约束制度。

从对各种经济体制的初步考察来看,世界上目前主要有两种成本约束类型:一类是经济主体内部生成的约束机制,它表现为经济个体(企业和个人)自身具有强烈的自我约束的倾向;另一类是外部管理形成的约束机制,表现为一个权威的管理主体(如国家、政府等)对经济个体的经济活动进行强制性约束。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可以看成是前一种类型的典型,其内部的成本约束机制来源于生产资料和财产所具有的清晰的产权关系;而社会主义国家中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则是后一种模式的典型。

三

从历史角度看,中国是一个缺乏成本约束制度传统的国家。如果说有约束的话,也主要是一种外部的强制性约束,并表现为主要依靠行政权力和非经济的社会道德、观念、意识形态等方面的约束手段。而中国在成本约束制度方面薄弱的主要原因是缺

乏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稳定的、合理的对社会财产和个人财产的保护制度及其清晰的产权关系,同时对人在经济活动中的本能行为倾向具有相当模糊的认识。

应该注意到,传统的公有制理论使得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中的产权关系(如果有这种关系的话)对行为主体的约束十分松懈,公有财产无法内在地规范行为主体;而对人在经济活动中的行为本能倾向的理想化认识也削弱了合理约束制度得以产生的必要氛围。

在中国的经济改革中,时常出现互相矛盾的状况:我们既需要社会成员和企业具有西方那种经济人式的对利益的强烈追求精神和进行经济活动的冲动,并且实际的改革进程也在培养和鼓励这种倾向;但我们同时又希望他们摆脱那种斤斤计较、本体利益至上的现象。

这种状况暴露出我们对经济人及对现代社会经济制度认识上的较大偏差。经济人在追求利益和进行经济活动时没有正当的或卑鄙的、高尚的或低下的等等区分,他只是进行一种选择,选择一种成本耗费最少、收益预期最大的活动路径和行为方式。而社会对经济人的规范就是设置“路障”,开通“道路”,变换“通道”,使经济人沿着社会所设置的路径活动和发展,并对那些违反规则和不遵守约束的行为进行严厉制裁。改革实践表明,一定程度上的接受经济人理论但又忽视对其进行约束的重要性,将产生混乱局面甚至是灾难性的结果。

最有效的规范经济行为的核心内容即是刺激经济发展的内容,两者是同一的。在市场经济环境中,经济的发展依靠经济主体对利益的强烈追求所产生的无限动力,则约束机制也应主要建立在利益约束方面;而在传统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中,经济的发展主要依靠国家计划推动和意识形态激励,而约束手段也主要体现在计划、命令和意识形态方面。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来

说,经济发展的刺激因素随着经济体制的转变而转变,那么,约束制度的内容和方式也必须随之转变。两者之间的不对称或错位,会导致整个社会经济运作的混乱和无序。

四

中国的改革由于在约束制度建设方面的滞后,使得改革在获得最初的冲动之后,进入了步履维艰的阶段。

成本约束的滞后,使得在利益放开和利益赋予为特点的中国改革中,社会成员和企业利益追求的激情呈现补偿性爆炸,逐利欲极度膨胀。他们的选择目光全方位搜索。这对于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深化来说,是一个必要的前提,但必须对这种冲动加以合理的引导和严格的规范。不幸的是,在约束制度松懈的条件下,私利的选择目光不约而同地瞄准了缺乏有效监管的国有资产。公有的、产权不清晰的国有资产成了个人和企业谋取私利的手段和成本。约束的松懈,使得国有资产的利用效率和运作中的费用大小与经营者的收益脱节。国有企业的成本增大当然会影响企业的收益,但不影响某些个体的收益,并且现实地出现一种悖论:成本的增大成了个人收益增加的源泉。这其中的运作机制正是制度规范所忽视的。

在约束制度松懈状况下,成本具有无限扩大的倾向:因为个人的逐利欲望是无限的,为了个人收益的增加就将成倍地放大成本!于是,国有企业效率下降、经济效益持续滑坡也就成为一种趋势了。

约束松懈造成一系列问题,突出地表现为三个特点:

第一,成本外部化。由于约束制度的薄弱,使得成本与收益之间的联系非常松懈,并且主要依靠与市场经济体制不很适应的道德约束和意识形态规劝。但在行为主体强烈的逐利冲动下,这些软约束被冲得粉碎,国有资产成了不需花费代价的个人获利的